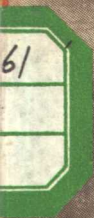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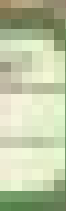
隆隆声雷

威廉·加拉赫著



隆隆声 雷田

威廉·加拉赫著



雷 声 隆 隆

威廉·加拉赫著

崑 然 譯

世 界 知 識 社

1956年・北京

William Gallacher
THE ROLLING OF THE THUNDER
Lawrence & Wishart
London, 1948

根據勞倫斯·葛沙特書店1948年英文版譯出

雷 声 隆 隆
〔英〕威廉·加拉赫著
崑 然 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3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張 $7\frac{3}{8}$ ·插頁2·字數164,000

1953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7)0.80元

統一書號11003·26

封面設計者：孫正 校對者：盛振鐸等

6092-67

聽啊，雷聲隆隆！

看那太陽！看普天之下

出現了憤怒、希望和奇蹟，

羣衆的隊伍邁步前進。

——威廉·摩里遜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0
第三章.....	50
第四章.....	80
第五章.....	98
第六章.....	119
第七章.....	138
第八章.....	156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93

序

作者寫了一本新書，請他的秘書作篇序，似乎是一件不常有的事。威利·加拉赫（威利即威廉的暱稱——譯者）這樣做，大概是因為他感覺到我除了打字以外，一定還要對這本書多負責任。要說這本書得以和讀者見面的理由之一，是由于我在1943年快到年底的一段時期內不斷地催促他，那倒可以算是事實。我被加拉赫在下院走廊里每次大約半小時的零碎時間中所談的那些許多政治舊聞軼事所感動，越來越強烈地覺得這些片斷旧事大多數應該記錄下來。所以，我為了像我自己一樣比較年青的同志們，向他力爭。因為我們年青人學習歷史，尤其是學習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工人階級的歷史，主要的還是靠教科書。

教科書的乾燥無味，是人所共知的。而加拉赫的文字不枯燥，也是人所共知的。有一位編纂1945年議會議員簡歷的作家，曾經提起加拉赫的“刻毒的筆”。這樣就形容錯了。他的文字的確是坦率的，而且常常是尖銳的諷刺；可是加拉赫所喜歡用的武器却是大鐵鎚。“克萊德起義”的讀者，總還記得他把1914年到1918年大戰期內的左派運動，無論在事實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寫得很生動。“克萊德起義”結束的地方，也就是這本書開始的地方——由1920年組織英國共產黨起，敘述多難的18年中的故事，直到1939年英國參戰為止。

這本書很自然地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年青的共產黨

的成長、成就和困难。在这一时期里，他和建党工作密切地关联着，虽然他的主要工作还是演講和宣傳。第二个时期是1935年他被选入議會而成为第一个共產黨議員后所做的比較專門的工作。書中沒有把他在議會里的工作詳細記載（因为这类材料已另行出版，而且是很生动的記錄），可是关于他怎样和为什么能够抵抗下院中曾經削弱許多工人階級代表的鋒芒的那种“使人圓滑的力量”，寫得非常清楚。

我肯定地認為，由于這本書通过英國最坚定的革命領導者之一的事蹟而把歷史寫得“活靈活現”，這本書一定会帮助工人运动中年青一代了解在兩次大战之間这一段时间內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懂得失敗和灾难的原因，并且認清如果要使社会主义在英國得以实现，那末就需要更多的像威利·加拉赫这样專心致志、努力不懈的人。

爱琳·墨萊

1946年7月

第一章

1920年夏天，气候正酷热的时候，我作为参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到了莫斯科。由紐卡斯尔到卑尔根一段，我是偷渡过來的。然后才以普通旅客的身分由卑尔根到北角，由北角到摩尔曼斯克，由摩尔曼斯克到列寧格勒，再到莫斯科。因为我不能攜帶行李，所以有点衣衫襤褸。可是我終於弄到一条褲子，一件俄國上衣，一双鞋。这样，我就可以应付一切了。

在一个星期六大約中午12点鐘的时候，我到了莫斯科。我吃了一份乾的黑麵包，随后就被邀到一家翻砂厂去干了一下午工作。工作相当繁重，可是大部分時間有一个乐隊演奏，讓我們一面干活一面还有音乐可听。星期日我被邀到运动場去担任英美足球队隊長。我一生中虽然踢过几次足球，可是像这一次的情况还没有經歷过。我們这一边几乎每一位隊員都没有什么經驗。只一会兒功夫，俄國球隊就明顯地取得了压倒的优势。所以我就改守球門。大半个下午，他們簡直一直是在打球門，間或把我这守球門的也踢兩下，好像比踢球更有意思似的。他們踢進11个球，我們这边毫無办法。我沉不住气，就从我們这边一直把球盤过整个球場，踢進了唯一的一球。这一下博得“滿堂采”。等到最后吹哨停賽，我被抬出球場。正合適，因为我已經走不动了。深夜里，我去找医生医治身上的許多創伤。在候診的时候，

我遇見一位優秀的法國青年同志，名叫勒菲弗爾，他的英語說得相當好，人非常熱情，他希望在回到法國以後干一番大事業。

第二天，我和一班人同到克里姆林宮，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在這裡舉行。傑克·唐納和大維·蘭姆賽比我先到，他們介紹我和許多國家的代表見面。在這些著名的優秀代表中間，同我在很多方面都很合得來的一位是美國代表約翰·里德，他是“震動全世界的十天”那本名著的作者。我還很高興地會見了我早已聽說過的卡爾·拉狄克。他口若懸河而且十分刻薄。在會議期內，他不止一次地發揮他這種本領而使我受窘。介紹以後，當我們穿過一個接待室的時候，忽然有人說：“列寧同志，來見見加拉赫同志。”這完全是意想不到的。同許多人一樣，我一向讀列寧的書，思念列寧，也談論列寧。現在他就在我身旁，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謙虛、和善和熱情的同志。我們握了握手。我什麼都不會說了，只說了一聲：“你好”，他說：“歡迎你到我們這個蘇維埃國家來，加拉赫同志。”

過了一會，我們四週的鬧鬧嚷嚷多少平靜一些了，他說：“加拉赫同志，等你有功夫的時候，我要和你談談。”我對他說，“好的，列寧同志，我也想和你談談，當你有功夫的時候。”當時我想起了我到達列寧格勒這個名城的時候所經歷的一件特別的事情。我被帶往斯摩爾尼學院去領取前往莫斯科必需的證件——要知道，我由紐卡斯爾到列寧格勒，一路上是什麼證件都沒有的——那里負責的同志們給我一本書，並且說：“我給你辦證件的時候，你可以看看”。這本書的名字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當我讀到英國部分的時候，我十分驚異地發現我受到了很尖銳的批評。事情原來是這樣：在我離開英國的幾個月以前，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來找我，告訴我她將要到大陸上去看

几位同志，請我給她寫一封信，簡略地說明我對於當時英國情況的意見。我寫了一封信給她，不但批評了麥克唐納一班人，也批評了英國社會黨（我也是該黨黨員），並且很堅決地陳述了我自己反對參加議會的意見。隔了些時候，我收到英國社會黨寫到培斯利我家裡的信，問我肯不肯和伯爾納·貝爾斯爵士在倫敦金斯威大廳辯論，為布爾什維克的立場辯護。關於這一問題，我曾經和蘇格蘭副檢察長在伯斯辯論過，也和薩羅利亞教授在愛丁堡辯論過，所以這次毫不遲疑地應戰了。當我將參加辯論會、代表英國社會黨為布爾什維主義辯護這件事公開宣布的時候，西爾維亞·潘克赫斯特立刻把我給她的那封信刊登在她的“工人無畏艦周刊”上；這樣就使人們認為我是在答應參加辯論以後，跟着就寫信給“工人無畏艦周刊”的。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書在談到這封信的時候，是這樣說的：

“關於參加議會問題，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証了登載於該期周刊上加拉赫同志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加拉赫同志用格拉斯哥地方‘蘇格蘭工人委員會’名義寫的，他寫道：

‘本委員會肯定地反對議會制度，而且各種政治組織的左派都是贊助這委員會的。

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的代表，這個革命運動的目的是力圖在生產中（在生產各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建立以全國各處社會委員會為基礎的共產黨。我們同正式的議會議員吵鬧得夠久了。我們認為不必公開向他們宣戰，而他們也害怕攻擊我們。

然而這種情況不能長久繼續下去。我們在全部戰線上正在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的普通黨員羣衆，一想起議會制度，就愈加覺得討厭；幾乎一切地方團體都完全贊成蘇維埃或工人委員會。

當然，這對於那些吃政治飯的（或以政治為職業的）先生們，有極嚴重的意義，因此他們用盡一切方法，說服他們的黨員回到議會主義方面去。

革命的同志不應當擁護這伙匪徒。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將是很困難的。這場鬥爭中，最壞的一點，便是那些把私人利益看得高於革命利益的人們的叛變。

對於議會主義的任何擁護，簡直就是幫助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一流人物，使政權落到他們手里去。亨德孫、克略英斯之徒已是無可救藥的反動派。正式的獨立工黨，日甚一日地受到資產階級自由黨勢力的支配，這些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斯諾頓這伙人的營壘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寄託。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黨員羣衆則贊成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擁護機會主義的議員，這都不過是幫助上面這班先生們。

英國社會黨在這方面毫無作用……

這裡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生產的（工業的）組織以及根據顯明確切的科學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同志們能夠幫助我們來建立這種組織與共產黨，那我們便不勝歡迎；如果同志們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擁護反動分子來叛賣革命，那麼，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這種反動分子非常貪圖攫取議員的“尊號”（？），如火如荼地想證明他們也和“主人”階級中的政治家一樣，能夠有成效地統治國家。

這封致編輯部的信，據我看來，把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

剛剛开始接受共產主义的普通工人的情緒和观点，表現得異常透澈。这种情緒最值得欢迎，最有价值；应当善于重視和贊助这种情緒，因为沒有这种情緒，則英國的——而且是任何一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会是沒有希望的。善于表現羣众这种情緒的人，善于在羣众中喚起这种（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未喚醒的）情緒的人，應該加以愛護，應該关心地予以种种幫助。但同时必須直接公开地告訴他們說：在大革命鬥爭中領導羣众，單靠情緒是不夠的；最忠實于革命的人們所將要犯的或已經在犯的某種錯誤，乃是足以妨害革命事業的錯誤。加拉赫同志致編輯部的這封信，毫無疑義地包含着德國‘左派’共產主义者所犯着的和俄國‘左的’布爾什維克在 1908 年和 1918 年所犯過的一切錯誤的萌芽。

該信作者義憤填膺，表現出最可寶貴的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階級政治家’的仇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老百姓’都了解和切近的一種仇恨）。被壓迫和被剝削羣众的代表所表現的這種仇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母’，實在是任何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但是，這封信的作者大概沒有估計到：政策乃是一種科學，乃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不是自空而降，不是可以白白得到的；無產階級若想要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治家’，而且要使這種政治家不弱於資產階級的政治家。

該信作者明白了解，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只能是工人蘇維埃，而不是議會，凡是至今尚不了解這點的人，不論他是最有學問的，是最老練的政治家，還是最誠懇的社會

主義者，是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最誠實的公民和謹守家風的人，但他總是一個最凶惡的反革命。然而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加入議會里去，不從議會內部來瓦解議會制度，不由議會去準備蘇維埃將來勝利解散議會這一任務，這樣是否能夠使蘇維埃戰勝議會呢？——這封信的作者連這個問題都沒有提出，甚至不曾想到提出這個問題的必要。但同時該作者卻說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的原則來行動。科學所要求的是：第一，要估計其他國家的經驗，尤其是這些也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正在經歷或不久前已經歷過的很類似本國情形的經驗；第二，要估計到在該國內部活動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羣眾，絕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的願望與見解、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來決定政策。”

這件事真有點令人震驚。就是用最委婉的態度對我說，我的意見代表德國“左派”所犯過一切錯誤，我也有點吃不消。我必須坦白承認，當時我對我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都有點估計過高。因此大家就可以理解，當我發現自己竟然被列入革命運動中幼稚分子裏的時候，就覺得非有所申辯不可了。所以在莫斯科這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舉行會議的政治委員會上，我就得到一個機會把我的觀點堅決地表達了出來，同時又表示反對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這本書中關於我的意見。我在發言的時候對列寧同志說，當我在英國而他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可以把我當作一個幼稚分子看待，但是“我現在已經到了這裡，你可以看得出我是干這種工作的老手”。幾個月之後，在莫斯科代表剛剛組織起來的英國共產黨的威廉·保羅和列寧談話的時候，列寧用相當不錯的蘇格蘭口音告訴他：加拉赫同志

說，“我是干这种工作的老手”。这使保罗不禁捧腹大笑了。

可是，一般地講，我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間獲得了很有意义的經驗，也經歷了一些風浪。杰克·唐納、約翰·里德以及其他几个人和我一同組織了一个“左翼集团”，在每个問題上都为維護最左的观点坚决地進行斗争。有一天，当我正在大会上發表演說反对参加議會的时候，來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交給了大会的主席。主席打断了我的演說，向大会宣讀这份电报。电报是从英國拍來的，它說：“在与工党联合的基礎上，共產党已經在英國成立。它向第三國際伸出它的手”。坐在台下的拉狄克还是用他那种典型的刻薄口吻說，“加拉赫同志这可高兴了。”

“对了，”我回嘴說，“我希望这份电报会让拉狄克同志高兴。可是你要注意，电报上說向第三國際伸出它的手，而不是伸出双手。他們是一只手伸向第三國際——另一只手通过工党伸向第二國際，如果拉狄克同志就因为这一点而滿意的話，那就隨他的便吧。”

又有一次，英國社会党的一个代表（現在他是我國某工会的干部，又是工党議員候选人）發表演說，他給听众一个印象，好像共產國際接受并且听从了英國社会党的領導。随后我在發言的时候就把列寧和他的同伴們形容得好像生活在政治愚昧的黑暗中，由英國社会党的这位代表來用智慧的光輝照耀他們，使他們走到真正認識英國政治的境界。我講話的时候，“左翼集团”鼓掌欢呼。我一講完，列寧就立即要求發言，他說：“加拉赫同志說了一段笑話，代表們好像很喜欢听。可是这不是說笑的事，它太嚴重了。”接着，他就說明为什么他認為参加議會活动以及同工党联合這兩件事，是英國革命政党工作中的必要部分。他說英國社会党的这位代表的結論是正确的，可是他举出

來的論点是錯誤的。(我插嘴說，“他的論点向來是錯誤的。”那个代表高声喊叫“我抗議”，但是沒有一個人理會他的抗議。)

在开会期間，在大歌剧院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主席台上坐着各國党的代表。大部分代表，像意大利的謝拉蒂和德國的保羅、列維，都是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在他們本國的社會黨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除此以外，很長時間以來，不同國家的代表團，如包括斯諾頓夫人（現在已經是有爵位的夫人）以及那些和她同類型的人的英國代表團，曾先後到蘇維埃俄國參觀訪問。這些代表團，都是一班庸俗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俄國工人對他們實在不勝厭煩。這次在大歌剧院中的示威大會上的主要發言人只有托洛茨基，可是在他發言以前，先由別的人發言。英美代表團，不論左派右派，一致同意由我代表它們發言。輪到我講話的時候，主席季諾維也夫叫拉狄克先致介紹詞。拉狄克的發言，正如美國人所說的，“給我大捧一頓”。他說我是純粹由工廠出身的無產階級。等到我站起來的時候，來了一個勁人的場面——許多人高呼：“工人，工人，工人同志。”他們看見工人的時候是何等喜歡！听众里面，只有一個人沒有用任何方式參加這種熱烈的表示，那就是那天晚上發表演說的托洛茨基先生。他板着臉坐着，不聲不响。

散會的時候，人們都來找我談話，可是托洛茨基沒有來找我。他從我旁邊走過去，好像根本沒有我這個人似的。以後我在大會和委員會里遇見過他不少次，但他從來沒有和我交談過，也從來沒有同我握過手——大家知道，在俄國同志中間，這是一種很普通的習慣。托洛茨基代表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突出的類型，這一類人只有在為了要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而需要利用工人階級的時候，才肯費一點時間在工人身上。毫無疑問，

他自己的那一套花样玩得很漂亮。可是关于他在革命和建立紅軍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近年來却有人提出了一些極其荒謬的意見。有人認為他攻击斯大林是出于革命者对錯誤趋向的一种憤怒。但是，我們应当記得，就在革命以前，他也同样攻击过列寧。下面不过是一个例子：

“举一个关于托洛茨基对列寧、对布尔什維克党、对布尔什維克的‘真理报’的看的典型例子。1913年4月，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給孟什維克領袖吉黑澤說：‘專門以利用俄國工人运动中的一切落后現象为業的、特長于挑撥离間的列寧处心積慮地挑撥起來的腐朽的不和睦現象，看來是如何無聊的紛爭啊……列寧利用“真理报”做工具來進行宗派主义的陰謀和毫無原則的腐化活动……’”（魯·弗·安德魯斯著“托洛茨基真象”）

托洛茨基虽然有他自己的小集团，却一向是靠近孟什維克的，他恨列寧，恨布尔什維克，恨他們所执行的工人階級政策。直到1917年7月，整个潮流变得有利于布尔什維克的时候，托洛茨基为了避免完全孤立，才加入了布尔什維克党。对于准备力量來貫徹革命這項工作，他並沒有真正地參加進去。这可以由一件事实証明：全俄苏維埃大会在6月3日开会，孟什維克領袖澤列捷利在会上替那时还存在的臨時政府辯護的时候強調說：

“目前俄國沒有一個政党會說‘把政權交給我們。你們走！我們代替你們。’俄國並沒有這麼一個政党。”

（當他說這話時，會場氣氛是極其緊張而沉靜的。）突然，像一聲霹靂似地有人回答說：“有這樣一個政党”。瞌睡的代表們好像触电似地醒了。當列寧從大廳中間走上講台的時候，孟什維克的主席團大為驚慌。列寧說，“澤列捷利說俄國沒有一個政党會說